



#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以原理评说、原典引用为核心的考察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71)

〔摘要〕 本文尝试站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认识高度,采思想史的理路,聚焦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说尤其是原典引用进行考察,梳理和分析其认识历程、侧重、特点及其原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力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围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高扬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扬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认识论联系在一起;重视仍具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和结论的应用和阐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或重大问题的理论阐释上努力寻找并系统概括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观点,努力挖掘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性理论依据,其原典引用频率之高、篇幅之长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点。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领导集体; 正本清源; 发展创新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8)04-0082-14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刀阔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也是理论创新紧锣密鼓、与时俱进的时期。对于该时期形成并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界已有广泛研究,因此,本文无意重复已有的研究内容和思路,而是聚焦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说尤其是原典引用进行考察。进一步言之,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通常研究路径,本文的着力点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内容,而是采取思想史的理路,尝试站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认识高度,从历史文献所提供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典的直接言说和引用出发,客观梳理和分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历程、侧重、特点及其原因,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视角和内容创新。

〔收稿日期〕 2018-05-12

〔作者简介〕 杨凤城(1960-),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正本清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央领导集体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高扬发展的旗帜这样两个阶段。大体上说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构成了两个阶段的分水岭。纵观这十几年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上的思想历程，有两大特点十分突出，一是借助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通过力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克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在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逐步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重在把握其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的科学态度。二是围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高扬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社会主义建设是其最重要的实践，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总结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下面，让我们展开分析。

### （一）打破思想禁锢、正本清源

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之际，面临着严峻的理论僵化和思想禁锢，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自中苏论战开始，历经“文革”，愈行愈强；二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恪守。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的认识仍然笼罩着思想理论界，“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提出即是典型体现。如果不打破这一思想禁锢，党和国家便无从摆脱政治经济困局从而走上新路。从当年实际出发，邓小平首先抓住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契机，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从而拉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本清源的大幕。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于1977年4月致信中央领导，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sup>(1)</sup>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此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

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等等。由此，邓小平以“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为切入点，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在此后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批老干部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史的角度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只不过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常识，并无理论上的发明，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新阐述。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不影响其开启马克思主义之正本清源大门的地位。这只有联系“文革”的思想禁锢、联系“文革”后的“两个凡是”才能看得清楚。通过这场讨论，人们在思想理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几大原则：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三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重在把握其思想体系、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而不是寻章摘句，固守个别结论。正是因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上述原则共识，才促进了学界在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正本清源，例如关于过渡时期与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问题、“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法制问题、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同时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理论上的正确阐释和回答为中国共产党回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开辟治国理政新局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1979年1月，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谈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sup>(2)</sup>。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的回顾和评价切中肯綮。

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的认识牢固确立。早在1977年9月，陈云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就提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sup>(3)</sup>进入1978年后，邓小平在诸多谈话、讲话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sup>(4)</sup>；“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sup>(5)</sup>；“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sup>(6)</sup>，等等。可以说，实事求是构成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邓小平讲得最多的词汇。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一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sup>(7)</sup>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原则，这一原则对于矫正中国革命中一度流行的教条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而日后违背这一原则所带来的教训尤其是“文革”教训则非常沉重，正因为有了长期正反面经验的积累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实事求是​​是在邓小平这里又有了别样沉甸甸的分量。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因为邓小平等老革命家不厌其烦的重申，实事求是​​是才进一步扎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深处，才带来了思想解放、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 (二) 解放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转折，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历程。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同时，面向新实践新问题丰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亦渐渐浮出。早在1979年1月《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胡耀邦就提出理论宣传工作者有两大任务，一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冲破禁区、挣脱精神枷锁；二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sup>(8)</sup>。但是，理论“一定要认真面向实际”<sup>(9)</sup>，“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源泉就是实际”<sup>(10)</sup>。198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提出党的六大任务之一是“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真理，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切真理……以新鲜的革命经验丰富它，使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sup>(11)</sup>

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其中当然包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此后，从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出发，“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央领导人的理论强音。1984年12月，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专门谈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以社会主义为例，强调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当年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却不完全是这样”，比如“他没有想到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商品经济，这同我们现在的实践就大不相同。如果读了《哥达纲领批判》，有人就会说，现在中央搞修正主义，马克思不是这么说的。那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的，但是这些基本原理，也还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至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设想，更不能当成教条，因为前人不可能有我们后来的实践。马恩没有亲自干过社会主义，列宁干了一下为时又太短，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有些设想本来就不可能切合后来的实际，更不可能切合离他们这样久远的我们今天的实际……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包医百病”。“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丰富发展。”<sup>(12)</sup>胡耀邦的讲话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现实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问题立论，所谈内容具体而明确，不回避质疑，不大而化之，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共舞的情怀跃然纸上。

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再次表达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

化，“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只有从实际出发“勇于突破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sup>(13)</sup>中共十三大报告设专节阐述“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者要“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得出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sup>(14)</sup>。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报告着重阐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sup>(15)</sup>。二是“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在伟大实践中创造出伟大理论。<sup>(16)</sup>中共十三大以改革的大会著称于世，打破成规，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贯彻在方方面面，包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及至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更简洁明了地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sup>(17)</sup>邓小平的上述话语集中表达了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总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面向实际，实践第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成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鲜明

立场。

(三) 通过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最重大的问题，是检验其马克思主义观的最重要试金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大体上从1984年到1987年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高频率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出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等。邓小平从1984年开始频繁提出上述问题，自然和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决议所需要和带来的思想氛围有关，邓小平对这个决议评价很高，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sup>(18)</sup>，里面说了许多过去会被视为异端的新话。及至1988年5月，在会见莫桑比克外宾时，邓小平有了结论“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他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sup>(19)</sup>。邓小平这样讲，显然和1987年中共十三大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有关。如果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大门，中共十二大尤其是邓小平的开幕词标志着中央领导集体有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那么，中共十三大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作了理论总结和阐述，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明确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有了初步但却是基础性的解答。

邓小平在1980年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断发问，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长期以来，人们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等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们在理论上确实有马克思主义依据，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没见过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时间

短,那么,他们曾经的设想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科学,就需要实践检验。况且,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对详细设计未来社会(认为那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干的事情),反对将他们的某些结论当作教条。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这一点在中国“文革”及其前后恰恰被忽略了,甚至产生了“穷则革命富则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越穷越光荣”等荒唐理念。经过数十年的实践,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何在?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到了“文革”后邓小平等政治家面前。

纵观邓小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讲话、谈话,讲什么是社会主义,除生产力标准外,讲得最多的是共同富裕和公有制主体地位。如果说在1984年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前,主要是强调生产力标准,那么,此后则在继续强调生产力标准的同时,又加上且反复重申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sup>(20)</sup>。及至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明确概括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21)</sup>

既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那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自然是发展生产力,对此,邓小平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讲得十分明确了。可以说社会主义本质论和根本任务论,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核心认识,是他基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又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如果说,马克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有过设想,那么,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不可能作出回答。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更多是随机的、不系统的、缺乏足够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无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是新经济政策均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一度兴起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研究热,条分缕析地概括、分析其内容并给予高度评价。其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为最初的改革开放举措寻求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合法性支持,其积极的历史作用应予肯定。

但是,实际上它能提供的理论资源十分有限。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理论总结主要源于鲜活的实践,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而非具体内容。有些理论或原则马克思主义那里根本找不到,例如,邓小平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不断提到用“一国两制”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说“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的”<sup>(22)</sup>。类似的话邓小平讲过许多次。在其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有的问题的具体答案甚至恰好和马克思的预计相反,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在邓小平理论中,除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与根本任务论之外,最具理论性、最能体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当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和深入,在此无需赘述,我们只是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依据,无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构成具有母体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发展,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回答和最重大的理论创新之一。

## 二、与时俱进,以实践为中心创新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最具震动性的国际事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西方新闻界、政界和学界一度兴奋异常,甚至得出了历史终结论。在此严峻形势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无法回避的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世界单极与多极化的角力曲折复杂,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交锋变化多端,马克思主义面对着的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大变局。就国内而言,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而更大地融入以经济为核

心和基础的全球化体系之中。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已经看到了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趋势，以及由此给中国带来的机会，因此努力要将中国带入其中，然而，这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中国要逐步熟悉世界，世界也需要认识中国。形象地讲，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浪潮还可以做观潮者、热身者、试水者。可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便大不一样了，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已经不可能再上岸观潮，他必须做弄潮者，不仅如此，还需要具备“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本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时代，如何界定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前所未有的考验。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曾就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表过长篇讲话，感慨“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前进”<sup>(23)</sup>。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反复重申：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综观江泽民同志执政中国的十三年，概括言之，因为苏东剧变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正是国际风云变幻最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马克思主义认识史角度而言，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期。十三年间，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带入一个新境界。就此，我们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

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根据新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整风以来就反复重申的立场和态度，毛泽东、邓小平均是如此。在这个原则立场上，江泽民同志也如此。如果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主要担心的是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曲解，捍卫他认

为的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共领袖再言说马克思主义，则主要面对的是党内外国内外的质疑和否定，尤其是源自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想与理论的挑战。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江泽民同志与邓小平的思路、主要观点是相同的，只不过更展开、针对的具体问题有别而已，进一步言之，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深刻总结历史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一些具体论述可能会过时，不再适用，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sup>(24)</sup>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sup>(25)</sup>，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归于失败。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防止形而上学和片面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基础”<sup>(26)</sup>。这里的继承性也很明显，毛泽东从延安时期以来一直如此，1980年代初陈云提出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十分赞成。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其提供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一直是中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传统。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sup>(27)</sup>。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 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那么，这一立场在江泽民同志那里则表述为“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两种表述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时代的加速度变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江泽民同志这里显得更为迫切、时不我待。如果说，邓小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全党一边正本清源一边又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走出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一边反思过去唯本本是从的危害，一边正视现实，在实践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到江泽民同志这里，便主要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科

技革命和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既聚焦国内实践，又需具备国际视野或全球眼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迈出更大更快的步伐，即不是一般性的丰富和发展而是创造性发展。

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sup>(28)</sup>中共十五大报告则讲得更为展开也更为明确“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sup>(29)</sup>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的这一段话，中央领导人在日后不断强调，或者原话重申，或者变换角度，或者变换表述，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sup>(30)</sup>；“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条件、具体斗争提出的具体观点、具体行动纲领，就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实际的变化，全部照搬照套”<sup>(31)</sup>；“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如果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那就不是真正的坚持”<sup>(32)</sup>；“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sup>(33)</sup>；“创新是最好的继承”<sup>(34)</sup>，等等。

自中共十五大开始，尤其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和阐释之际，与时俱进，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江泽民同志高频率高音量言

说的内容。他在许多讲话中不断提起，毛泽东曾经要求全党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他通过反复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尤其是毛泽东邓小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来说明他们“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人民日报》于2001年8月13日和8月17日先后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摘编》和署名钟言实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样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此后，《求是》杂志，各地党报党刊及其他学术与理论刊物，亦刊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的文章，一时之间，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热词。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再次庄严宣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sup>(35)</sup>

(三) 从时代和实践出发，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和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所处时代亦迥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这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结论，在努力挖掘其中仍然具有科学性的宝贵思想资源的同时，又作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阐释。综观江泽民同志任内的讲话或文章，他主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作出引用、概括和评价：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问题。江泽民同志任期内最重要的改革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最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沿着这一思路，理论界和学界努力寻找和阐释其理论与现实依据。在时代问题意识下，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得到新阐释受到新重视，其中，江泽民同志几次引用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

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sup>(36)</sup> 由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恩格斯在他晚年就已经开始觉察到这个问题了。他还引证说，列宁于1917年4月也曾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从而“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列宁又说“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江泽民同志提醒大家，“我引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话，是想引起同志们进一步注意，注意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以利于分清哪些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哪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我们同志的思想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概念上了，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sup>(37)</sup>

第二，关于“不能笼统地把股份制归结为私有或公有”。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进行的股份制改造，一度引起热议。相当一部分人将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针对这一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三个理论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二是股份制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一种社会资本；三是垄断资本的金融寡头可以通过金融手段，利用股份制控制比自身大几倍、几十倍的股份资本。因此，可以认为：第一，股份制是一种现代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或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第二，股份制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或资本运作的效率和竞争水平；第三，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sup>(38)</sup> 江泽民同志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断说明股份合作制不等于私有制，而是一种新出现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第三，关于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其自身的定位与建设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列宁在

20世纪初期曾经提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然而，现实是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有新的很大发展。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那么，这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成立了呢？

就此，江泽民同志不止一次地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出的著名结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由此出发，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西方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但是，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做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sup>(39)</sup>。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表现，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和空间。当然，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动向，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然归宿。但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sup>(40)</sup>

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文化交流与借鉴的迅速发展，随着人们价值选择的日趋多元化，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高度重视且慎重对待的重要问题。就此，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和教育，他指

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对人类的压迫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从这个意思上讲的。马克思主义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规律和自身命运的认识和把握，宗教观念会减少并最终消失。但正如马克思所言，“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由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学习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勇气”<sup>(41)</sup>，同时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存在的长期性，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妇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心的社会问题，且有着明晰的分析和结论，包括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等。可以说，在妇女观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能够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正因为此，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纪念大会发表的讲话系统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内容，第一，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它必将被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男女平等所代替。第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第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如恩格斯所言“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第四，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为生产关系所制约，也为生产力所制约，不仅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影响，也受精神文明程度的影响。第五，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sup>(42)</sup>

总的来看，高扬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认识论联系在一起；不放过任何一个仍具有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和结论的应用和阐释，构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

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2008年12月，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三十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sup>(43)</sup>从马克思主义认识史的角度看，这段话也是对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史的高度概括。

综观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的十年，中国在总体上实现小康后，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国民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度发展，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成就在世界经济因金融危机而陷入低迷的背景下显得更为亮丽，也更为世界关注。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值得自豪与骄傲的，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提出自然与此相关。中国实践中国经验需要理论总结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面临的考验和挑战也是严峻的。正是在世纪交替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价值失范与道德滑坡触目惊心。中国如何克服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好地体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回避而必须加以解答的。从国际环境看，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人类生活与交往方式产生愈来愈强烈的革命性影响，北非、中东和欧亚大陆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及相伴而来的国家动乱社会动荡此起彼伏，

西方强势语境下的文明与意识形态交流交锋日趋复杂化，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做出回应。如何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水平的时代课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共十六大后逐渐成为理论最强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然，就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心是时代优先、实践第一、中国本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强调的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强调的是实践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即一方面坚持一方面发展，在胡锦涛同志任内一如既往，且所用语言更多地源自或者相似于江泽民同志任内尤其是任内后期用语，这主要是因为时代与实践接近的原因。

综观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说与阐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高扬“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最重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认识应该说从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就开始了，改革开放后对待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当年评价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等等。中共十五大报告评价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胡锦涛同志任内，这一传统集中体现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评价上。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

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讲话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其中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sup>[44]</sup>

讲话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十七大闭幕后，胡锦涛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较系统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他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类社会发展要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sup>[45]</sup>因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

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此，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sup>(46)</sup>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对未来社会的描绘，“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变革，又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sup>(47)</sup>。

中共十七大报告郑重提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指出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有鲜明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十七大闭幕后，围绕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有鲜明中国特色”这一问题，学界、理论界讨论热烈。2008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就此作出系统阐释，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必须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等等。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sup>(48)</sup>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讲话具体列举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执政党建设等12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的，这个‘进’，主要就体现在提出了以上这样一大批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sup>(49)</sup>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后，在党内逐步形成共识，到七大前后更成为高扬的理论旗帜，其第一大成果当然是毛泽东思想。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一用语并未流行下来。进入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界政界越来越多地被重新提起，并加上了“大众化”“时代化”等语汇。这自然是时代和实践呼唤的结果，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十七大闭幕后不久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所以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他们的学说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sup>(50)</sup>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它与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如何理解？对此，习近平同志也有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的独特经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

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sup>(51)</sup>

### (三) 和谐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胡锦涛同志任内的一大理论创新，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联，胡锦涛同志有过专门阐述。2005年3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在回顾了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后，胡锦涛同志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提出以“和谐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也进行过名为“新和谐”的共产主义实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发扬民主，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

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一言以蔽之，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预期。

### (四)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的根本课题

胡锦涛同志任内，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建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并被视为党建主线。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源流关系，胡锦涛同志有专门论述。2005年1月，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他说“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是由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必须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必须通过全体党员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来体现其先进性。”<sup>(52)</sup>

纯洁性建设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被正式列入党建主线的，但此前已经有理论准备。2012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其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同盟创立初期，同盟章程就对保持党的纯洁性作出严格规定，要求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列宁在创建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也特别注重党的纯洁性，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高度重视保持党的纯洁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从而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sup>(53)</sup>

### (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中国改革起于农业和农村，农民是最早的受益者。然而，农民在满足温饱后，进一步富裕却步履维艰。随着改革的深入，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业难、农村穷、农民苦的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开启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强调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城市支援乡村、工业反哺农业

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陆续出台。在此过程中，中央领导集体亦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看待相关问题。2006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认为，农业是社会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生活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他们强调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主张建立和加强工农联盟。他们十分重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明确提出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未来社会要‘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sup>(54)</sup>

综观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一个特点较为明显，那就是在重大的理论创新或重大问题的理论阐释上努力寻找并系统概括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观点，努力从新的时代和实践需要出发挖掘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微言大义”以获取直接的理论支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待重大问题的解决更多地是回顾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经验和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相比，江泽民同志在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邓小平理论中汲取思想资源的同时，开始注意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追根溯源，但频率还不高，除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该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直接的论述。到了胡锦涛同志任内，就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汲取理论滋养，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原典的概括与引用，无论其频次和篇幅均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点。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自2004年开始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理清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

工程，是考察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场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地位，既是执政党与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便同时具有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意义。当然，作为中共中央主导的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考量无疑是第一位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从各个角度、用不同的表述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政治重要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随着社会利益格局与人们价值选择的多元性变化性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考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一方面要警惕和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借时代变化和新的实践否定马克思主义，借创新马克思主义而背离或解构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要创新又不能背离，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及其中的具体观点、结论，否则所谓坚持和创新均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长期“左”的思想影响导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难以短时期内消除，理论阐释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另一方面国门打开后，西方各种思想思潮蜂拥而入，令人新鲜新奇、应接不暇。复杂的时代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马克思主义在诸多领域诸多问题上失语，颇为被动。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不断呼吁马克思主义者要站出来说话。然而，说话的音量和质量事实上均不能令人满意。进入1990年代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最强音，其中当然蕴涵着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力来改变与作为指导思想地位不相称的被动境况的目标追求。但是，实践证明这需要一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新自由主义、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各种现代与后现代理论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构成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思想多元的背景下，巩固并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引领社会思潮，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自2004年开始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便是具体的落实之举。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背

景，就是前文提到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如何将中国经验理论化、体系化成为时代呼唤。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重大举措，乍看上去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提供的理论观点没有多大关联，如何解释这一问题。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结晶，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一个新境界；怎样从理论上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关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关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召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便是马列著作的重新编译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专题研究。这一工作重在尊重原典原

理、正本清源，同时注重从时代高度挖掘和阐释经典作家思想中过去未被发掘或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内容。毫无疑问，工程的实施，对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和言说马列主义包括内容和方式两个方面均产生了影响。

总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历届领导集体，均从时代和实践要求出发，立足于中国，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原典；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共同立场；不过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和实践要求不同，他们言说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原典的角度、侧重和具体内容不同，并因此而各具特色。但不管怎样，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启示和经验。

#### （参考文献）

- [1] [4] [5]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114，126，143。
- [2] [8] [9] [10] [11] [12] 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9-110，117-118，119，129，278-279，366-367。
- [3] 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41。
- [7] [17] [18] [19] [20]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291-292，83，260-261，364，373。
- [13]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86-1187。
- [14] [15] [16]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57，59。
- [22]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914。
- [23] [25] [27] [30] [31] [32] [33] [34] [35] [39]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5，337，66，132，229，339，131，327，538，79。
- [24] [26] [29] [40] [41]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6，286-287，12，200，161。
- [28] [37] [38] [42]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6，199-200，615-616，106-107。
-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0。
- [43] [45] [46] [47] [48] [49] [50]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808-809，105-106，107，108，251，251-253，242。
- [4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62-363。
- [5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61。
- [5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10-611。
- [5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820-821。
- [5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68-269。

（责任编辑：张叶婷）